

百卷本

名誉主编 张岱年 季羨林
主编 史仲文 胡晓林

中国全史

8

人民出版社

K2
2:7

• 精装合订本 •

中国全史

第 8 卷

本 卷 书 目

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
中国魏晋南北朝科技史
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
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史
中国魏晋南北朝艺术史

(每册均由彩页隔开)

责任编辑：刘丽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卷本中国全史(合订精装 20 册)

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4.4

(百卷本《中国全史》丛书/史仲文，胡晓林主编)

ISBN 7-01-001456-6

I. 百

II. ①史②胡

III. 通史-中国

IV. K2

百卷本中国全史

BAIJUANBEN ZHONGGUO QUANSHI

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93 插页 40

字数：15500 千字 印数：1—1000 册

定价：1138.00 元

梁满仓 著

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

人民出版社

DM73/08

本卷提要
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、大变革的时期。政治上王朝频繁更替,政治中心由北向南扩展,各种战争不断发生,阶级关系多层复杂。经济中心向南转移,新的经济区由于土地开发得以形成,思想上儒道佛相互影响和吸收,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百家争鸣。民族关系正经历着空前的民族大融合过程。这一切,必然会给这个时期的习俗带来很大影响,其结果就是具有这个时代特点的习俗的形成。本书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,考察了这个时期的节令习俗、衣食居处习俗、婚姻习俗、丧葬习俗、鬼神崇拜及宗教习俗、娱乐习俗等,并着重考察了上述习俗的时代特征。

目 录

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

一、魏晋南北朝习俗概述	1
二、节令习俗	8
(一)元 日	8
(二)人 日	14
(三)正月十五	16
(四)正月晦日	18
(五)寒食节	19
(六)三月三	21
(七)五月五日	24
(八)七月七日	25
(九)九月九日	28
(十)腊 日	30
(十一)除 夕	33
(十二)社 日	34
三、衣食居处习俗	37
(一)服饰习俗	37
(二)饮食习俗	46
(三)居处习俗	63
四、婚姻习俗	69

(一)婚 礼	69
(二)早 婚	75
(三)门第婚	79
(四)其它婚俗	83
(五)北朝鲜卑婚俗的两次改革	89
五、丧葬习俗	104
(一)丧葬礼仪	104
(二)薄葬与厚葬	112
(三)归乡葬	124
(四)合 葬	126
六、鬼神崇拜及宗教习俗	131
(一)天意崇拜	131
(二)自然崇拜	157
(三)人神、人鬼崇拜	168
(四)物的崇拜	178
(五)宗教习俗	179
七、娱乐习俗	181
(一)竞技活动	181
(二)角智活动	198
(三)自娱活动	209
(四)其它活动	224
八、结 语	232

一、魏晋南北朝习俗概述

习俗是在一定时期、一定区域内人们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生活方式。当我们在习俗前冠以魏晋南北朝的定语时,习俗就由一般的抽象的概念变成特殊的、具体的生活方式了。魏晋南北朝的习俗,大体上包括如下内容:服饰习俗、饮食习俗、居处习俗、节令习俗、婚姻习俗、丧葬习俗、鬼神崇拜习俗、娱乐习俗等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比起前代,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这表现在:在服饰、饮食、居处等方面,南北差异越来越明显,在婚、丧、鬼神崇拜、娱乐、节令等方面,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,形成了一些新的东西。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,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。

首先是地理因素的影响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南方与北方在服饰、饮食、居处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。在服饰方面,南方盛行穿屐,北方却流行穿靴。屐是鞋的一种,多为木制,鞋底有齿,底比较厚,以使人的脚掌离地面较远。《梁书·孙谦传》载,广陵人高爽曾作谜语:“刺鼻不知嚏,蹋面不知瞋,齧齿作步数,持此得胜人。”谜底为屐。可知当时的屐面上有梁,鞋带从梁上穿过,系在脚上,样子似今日之凉鞋。又据有关史书记载,屐主要用于行走泥泞之路。这种穿屐习俗,显然与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关。南方雨量充沛,气候潮湿,穿屐可使脚透气,又可踏泥。而北方穿靴,恐

怕与御寒的需要有关。又如在饮食方面,南方善食鱼、虾、蟹等水产品,不仅在食用量上,而且在烹制方面都超过北方。而北方善肉食,尤其在畜肉方面,食量和烹制上又为南方所不及。如《晋书·王浑传》载西晋时,北方人和峤好美食,有一次皇帝到他家,发现他家的蒸肫味道甚美,便问他如何烹制的,和峤答:“是用人乳蒸的”。这固然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奢侈,也反映了贵族肉食的讲究。这种饮食方面的区别,恐怕也与地理环境有关。南方河湖纵横,水网密布,盛产水产品,北方虽水源较少,但适于畜牧和畜养家畜、家禽。又如拓跋鲜卑,在代北平城时,是以毛皮为衣的。《资治通鉴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》载,拓跋焘太平真君十一年(公元450年),南朝军队进攻虎牢,北魏群臣请派兵保护那里的谷帛。拓跋焘说:“马今未肥,天时尚热。速出必无功。若兵来不止,且还阴山避之。国人本著羊皮袴,何用绵帛!”但当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后,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。《魏书·元恂传》载,迁都洛阳后,孝文帝的太子元恂“不耐河洛暑热,意每追乐北方”。由于洛阳地理位置偏南,气候远比代北温暖,拓跋族穿皮裹氈的习俗显然已不适合,因此中原的绫罗绸缎必然会代替毛皮衣服。

当然,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估计过分。我们认为,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是有限的,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,第一,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,大多表现在服饰、饮食、居处等方面,而这些方面只是习俗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再把习俗划分成物质生活习俗和精神生活习俗两部分,就可发现服饰、饮食、居处等正属于物质生活习俗,是社会习俗的表层。这就表明,地理环境对社会习俗的影响,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限的。第二,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在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时,才能表现得强烈和突

出。地理环境的变化是极缓慢的,魏晋南北朝时南方与北方的地理环境的差异,在这个时期以前早已存在,受这种环境影响,南北方在服饰、饮食方面的差异也早已存在,但这种差异从未表现得像魏晋南北朝时这样强烈和突出。这是因为,魏晋南北朝以前,中国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在北方。夏商周自不必言,春秋战国时南方出现了楚、吴、越等政权,但又被北方的强秦所统一。此后又经过秦、西汉、东汉,这种政治格局一直没有改变。自从三国以来,孙吴在江南建立政权,中间经西晋的暂短统一,不久又有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相继建国,江南六朝一直持续了近400年。在漫长的岁月中,由于政权的凝聚力量,南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制度和特色,南方的习俗也具有了足以和北方平分秋色的影响。北魏末期,南朝梁将陈庆之送北魏北海王元颢返洛阳即帝位,陈庆之任侍中。有一次,陈庆之得病,访能治者。北朝士人杨元慎自言能治,陈庆之遂请他。杨元慎口含清水往陈庆之的身上一喷,祷告说:“吴人之鬼,住居建康,小作冠帽,短制衣裳。自呼阿依,语则阿傍。菰稗为饴,茗饮作浆。呷啜尊羹,啖嚼蟹黄,手把豈蔻,口嚼槟榔。乍至中土,思忆本乡。急手速去,还尔丹阳。若其寒门之鬼,头犹修,网鱼漉鳖,在河之洲。咀嚼菱藕,拈拾鸭头,蛙羹蚌臠,以为膳羞。布袍芒屨,倒骑水牛,沅、湘、江、汉,鼓棹遨游。随波遡浪,唼喁沉浮,白苧羞起舞,扬波发讴。急手速去,还尔扬州”。杨元慎此举,意在嘲笑南方人饮食习惯,但通过他的这篇祷词,我们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,江南地区在服饰、饮食方面,形成了自己与北方大不相同的特点。不但如此,南方的一些习俗,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北方渗透。如饮茶之俗,在北魏后期,一些北方贵族为招待南方投降的官员,尽管自己不饮茶,也要在家中备茶水。又如北魏首都洛阳地区的鲜鱼价

格,已经比牛羊还贵。再如螃蟹的加工方法,在南北朝末期已出现于北齐贾思勰的著作《齐民要术》中:“藏蟹法:九月内,取母蟹,得则著水中,勿令伤损及死者。一宿则腹中净。先煮薄糖,著活蟹于冷糖甕中一宿。煮蓼汤,和白盐,特须极咸。待冷,甕盛半汁,取糖中蟹内著盐蓼汁中,便死,泥封。二十日。出之,举蟹脐,著姜末,还复脐如初。内著坩甕中,百个各一器,以前盐蓼汁浇之,令没。密封,勿令漏气,便成矣。特忌风里,风则坏而不美也。”以上诸例,反映了南北方习俗的差异及互相影响。

与地理环境对习俗的影响相比,社会环境对习俗的影响要更广、更深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战乱频仍,政权更替频繁,人民流徙成潮,佛教盛行,道教发展,民族迁徙与融合,中西文化交流,这一切都给当时习俗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各种战争不断,如朝代更替的战争,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,对立政权之间的战争,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战争,南北之间的战争,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战争等。战争加自然灾害,使人口锐减。据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注引《帝王世纪》载,西汉平帝元始二年(公元2年),有民户一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,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,为西汉时最高的户口数。至东汉桓帝永寿二年(公元156年),仍有民户一千六百零七万零九百六十,口五千零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,略少于西汉户口最多时。但经过东汉末到三国的战乱,曹魏景元四年(公元263年)灭蜀后,魏、蜀两国户口的总和加上吴亡时的户口数,全国共有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,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,这个数字仅为东汉永寿年户数的13.73%,口数的15.32%。各封建政权为了恢复和占有一定数量的人口,除实行减轻剥削、奖励生产、招徕流民以及进行括户斗争外,还纷

纷实行奖励早婚早育多育政策。在这里,战乱对早婚习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,民间对各种神灵的祭祀相当普遍,而且虽屡被封建政府禁止却始终不绝。观其祭祀的目的,一为乞求生子,二为避祸驱邪,三为健身去病,四为卜问吉凶,五为禳除水旱之灾,六为乞求丰收年景。人们向神灵乞求的,正是人间难以得到的,正是这种水旱成灾,瘟疫蔓延,社会动荡,战争不断,人们欲求安宁而不得的社会环境,使民间祭祀十分盛行,这又反映了社会环境对宗教和鬼神崇拜习俗的影响。

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生活中,政权更替十分频繁,曹魏代汉、西晋代魏、宋晋更替,齐宋更替,梁齐更替等,都采用禅代形式。上述各开国之主,除了手中拥有强兵之外,还借助谶纬将自己神化。为了使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禅代之举是代表天意,此时期的谶纬大多采用比较简单的谶语的形式。可见这个时期谶纬流行,形式简化,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人民流徙范围之广,数量之大,也超过了前代。仅以西晋永嘉之乱以后,人民向南方流徙为例,王仲荦先生将此种流徙分为七个时期:永嘉元年(公元307年)司马睿移镇江东,北方流民相率过江;太兴四年(公元321年),祖逖病死,郗鉴自邹山退屯合肥,祖约自譙城退屯寿春,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、淮水以北地区,流民渡江者转多;永和五年(公元349年)梁接起义雍城,石虎愁怖病死,石赵政权崩溃,桓温出兵关中,雍、秦流民多南出樊、沔,或至汉中;太元八年(公元383年),淝水大捷,苻坚败亡,黄河流域再度分裂,中原流民相率渡江;义熙十二年(公元416年),刘裕北伐,河南、关中次第收复,既而复失关中,刘裕死,又失河南,流民南渡者转多;宋元嘉二十七年(公元450年),北魏南侵至瓜步,流民南渡江淮;宋泰始二年(公元466

年),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,流民南渡江淮^①。这一次次的流民浪潮,将大批北方人送往江南,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,必然也会与南方交融、影响。以居处习俗为例,北方的胡床正是随着流民南徙而在江南广泛使用的。胡床在南方的流行,不仅使坐具专门化,而且使传统的坐姿也开始发生变化,这是社会环境对习俗影响的又一例证。

西晋以后,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在中原建立政权,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。这种情况对此时期习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如在饮食方面,关于胡饼、胡桃、醴酪等记载很多,这当与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影响有关。又如拓跋鲜卑从北方的大兴安岭地区南迁至代北,孝文帝时,又迁都平城。在拓跋鲜卑一路南下的整个过程中,他们的衣、食、婚姻等方面的习俗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。拓跋鲜卑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习俗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是自觉的,是为了更稳固地在中原站住脚,取得汉人对其政权的支持。这也反映了社会环境对习俗的影响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自西汉以来的儒学独尊的局面受到猛烈冲击,玄学的兴起,在思想上打破了死水一潭的局面,为佛教、道教的兴起扫清了道路。在这种基础上,外来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,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得到长足发展。佛、道的兴盛和发展,从文化习俗意义上来说,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。梁武帝佞佛,他即位后,相继发出《断杀绝宗庙牺牲诏》、《断酒肉之》等,这对南朝的饮食习惯不可能没有影响。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地狱、冤魂报应等观念,显然是佛教影响的结果,而占卜、占星、相面、相宅、相墓、望气、风角等方术的流行,显然是道教影响的结果。

^① 王仲荦:《魏晋南北朝史》。

中外文化交流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特点。尤其在北魏时,与西域联系的丝绸之路又被打通,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又重沟通。这种交流,对此时期的娱乐习俗的影响十分明显,比如握槊这种竞技游戏,就是从西域传入,后与南方流行的双陆互相融合,形成唐宋时期流行的娱乐项目。又如在这种交流影响下,大量的西域乐器传入内地,西域乐曲也开始在中原流传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载:“今曲项琵琶、竖头箜篌之徒,并出自西域,非华夏正器。《杨泽新声》、《神白马》之类,生于胡戎,胡戎歌非汉魏遗曲,故其乐器声调,悉与书史不同。其歌曲有《永世乐》、解曲有《万事丰》、舞曲有《于阗佛曲》。其乐器有钟、磬、弹箏、搯箏、卧箜篌、竖箜篌、琵琶、五弦、笙、箫、大筚篥、横笛、腰鼓、齐鼓、担鼓、铜钹、贝等十九种,为一部。”西域乐器不但用于朝廷的盛典,也用于人们的娱乐欣赏。如《北史·恩幸传》载:“其曹僧奴、僧奴子妙达,以能弹胡琵琶,甚被宠遇,俱开府封王。”《颜氏家训·教子》载:“齐朝有一士大夫,尝谓吾曰:‘我有一儿,年已十七,颇晓书疏,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,稍欲通解,以此伏事公卿,无不宠爱,亦要事也’。”西域乐器如此被北朝贵族公卿欣赏,从中可见中外文化交流对北朝娱乐习俗的影响。

综上所述,我们说,魏晋南北朝习俗的形成,与当时的地理、社会有密切的关系,其中社会环境对习俗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。

二、节令习俗

中国古代的“节”，并不是我们今天“节日”的概念，而是指节气。古时有“四时”、“八节”之称，“四时”指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“八节”则指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、立冬、冬至八个节气。在不同的季节和节气中，人们举行不同的仪式，进行各种活动。随着季节不停地周而复始的变化，这种活动和仪式渐渐地分别固定在一年中的某一日上，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传统节日。这种节日，在魏晋南北朝时被称为“岁时”，就是指一年一度的固定时日。这个时期的“岁时”很多，现将它们分别介绍。

（一）元 日

元日为夏历的正月一日，又称为“元正”、“正旦”。因为它处于一年的开端，一月的开头，一日的开始，所以又称为“三元”或“三正”。元日在魏晋南北朝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，每年此时，上至皇室贵族，下至庶民百姓，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。

朝廷年年元日都要举行朝会。东汉末建安年间，刘劭曾到许昌，当时曹操正定都在这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时值岁末，主管星历的太史预言，元正将发生日蚀。群臣闻此，纷纷来找尚书令荀彧，主张停止朝会。刘劭正在荀彧的住所，便说：“古时候的梓

慎、裨竈是著名的史官，他们也有算错的时候。有的时候灾异自己会消失，有的时候是史官推算有误，所以不应因为天象将有变异而废行朝礼。”荀彧非常赞同，便建议曹操照常举行朝会，日蚀果然也没有发生^①。类似的事情在西晋咸宁三年（公元277年）、四年（公元278年）、东晋太兴元年（公元318年）、建元元年（公元343年）及永和年间（公元345—公元356年）都发生过，所不同的是，这几次都因天象变异而停止了朝会^②。另外，十六国时后赵、南燕，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南北朝的北魏、北齐、北周都有元日朝会的记载，这说明，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除个别年份外，朝廷中一直进行着元日朝会的活动。

元日朝会的仪式，在西晋《咸宁注》中描述得很详细。在元日之前，事先为王公卿校在端门外准备好简易座位，并在宫殿前准备好乐队。群臣到齐后，宫廷中火盆大燃，群臣从云龙门、东中华门进入，来到东阁下坐待。皇帝在一片鼓乐声中出来，百官皆伏拜。鼓乐停后，百官按品位高低依次献礼贺拜，最后是少数民族客人进拜。贺拜毕，皇帝入内稍事休息，然后在一片钟鼓乐声中复出。主管接待宾客的谒者将王公至二千石以上的大官领上殿，依次向皇帝献寿酒。献酒时，献酒者先将寿酒跪授侍中，由侍中将酒跪置御座前。然后献酒者自酌，置己位前。此时谒者跪奏说：“臣某等奉觴再拜，上千万岁寿。”侍中答：“觴已上。”百官伏称万岁，四厢乐声大起。寿酒献完，皇帝开始进御膳，群臣也就席进食。食毕君臣一起欣赏乐舞，直至宴乐结束。元会时的盛况，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描绘得更加生动。曹植的《正会诗》说：

初岁元祚， 吉日惟良。

① 《三国志·魏志·刘劭传》。

② 《宋书》卷十四《礼志》一。

乃为嘉会，宴此高堂。
 尊卑列叙，典而有章。
 衣裳鲜洁，黼黻玄黄。
 清醑盈爵，中坐腾光。
 珍膳杂遄，充溢圆方。
 笙磬既设，箏瑟俱张。
 悲歌厉响，咀嚼清商。
 俯视文轩，仰瞻华梁。
 愿保兹善，千载为常。
 欢笑尽娱，乐哉未央。
 家室荣贵，寿若东王。^①

晋人傅玄《元日朝会赋》也说：

前三朝之夜中，夜燎晃以舒光。华灯若乎火树，炽百枝之煌煌。六钟隐其駉奋，鼓吹作乎云中。^②

通过一诗一赋，我们仿佛能看到群臣身着华贵的衣装，进贺元日；仿佛能看到庭中熊熊的燎火和烂若火树的华灯；仿佛能听到那悦耳的钟鼓乐声。

南北朝时，南朝的元日朝会与魏晋时差别不大，北朝则有其独特之处，其中尤以北齐最为典型。北齐除元日大宴群臣外，有两点异于南朝，第一，北齐元日有中宫朝会。中宫指皇帝的后宫，即嫔妃公主朝拜皇后之仪。第二，北齐元日有宣诏慰劳州郡国使臣之举。元会之日，各州郡国派使者进京。皇帝派侍中宣诏，一方面向各州刺史问好，问各地的庄稼长势和粮价高低以及人间疾苦；另一方面指示各州郡长官要勤政爱民，判案公正，赋役均

① 《太平御览》卷二十九。

② 《太平御览》卷二十九。